

ZHAOXINYU
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赵心愚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纳西学丛书

赵心愚◇著

民族出版社

纳西学丛书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和仕勇◇执行主编
赵心愚◇著

ZHAOXINYUNAXIXUELUNJI

纳西学论集



赵心愚



民族出版社

我是这样走上纳西族 历史文化研究道路的（代治学简历）

我于1953年7月出生于重庆市的一个教师家庭。我的父亲名赵文杰，是位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学历史教师，20世纪30年代末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可以说，我之所以对历史学感兴趣，恢复高考后决定报考历史专业，后又努力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并从事民族历史研究，与好读史书的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我读完小学二年级放暑假的时候，父亲曾一句句教我背诵“中国朝代歌”。当时只是有口无心死记硬背，想不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对考历史的某道题却产生了没有想到的作用，自幼熟记的“中国朝代歌”使我答这道题得了满分。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从事的学术研究主要在中国方志史与川藏清代方志研究、南诏与吐蕃关系研究、纳西族历史文化与纳西族、藏族历史关系研究、康区文献整理与藏族历史文化研究等几个方面。其中，纳西族历史文化与纳西族、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是这十年来研究的重点，取得的成果也相对多一些。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并介绍这方面研究的重点及取得的部分成果。

我生在重庆，也长在重庆，坦率地讲，在上大学之前，对纳

西族没有太多的了解，只知道纳西族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记得大约是在1980年下半年，也就是读大学三年级下期时（七七级这一届为春季招生），一堂课和一本书，使我对纳西族有了较多的了解。一堂课，指任乃强先生讲的一堂课；一本书，则是任乃强先生所著的《西康图经》。早在上大学之前，我从好地方史的父亲口中已知道了任乃强先生及所著的《西康图经》，并听说了一些任先生勇闯高原，在康藏开展地理和地方史研究的传奇经历，但一直没机会听他的课、读他的著作。任先生讲的那堂课，主要是讲吐蕃史，讲汉藏文化的交流。讲授之中，他讲到了吐蕃进入川、滇，中间就讲到纳西族的先民麽些，虽然只是提到几次，但我印象很深。听了这堂课后，不知为什么我对纳西族历史便产生了一些兴趣，感到有必要看看《西康图经》，于是就到学校图书馆借了这本书。读完这本书后，我知道了木土司、木天王，知道了丽江、维西，也初步了解了明代丽江纳西族土司北上进入川、滇藏区称雄一时的那段历史。记得看到这本书转载的J.F.洛克拍摄的有关照片后，当时我就有了到丽江去访古的念头。实事求是地讲，这本书读后，对纳西族的历史我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因为这本书重点是讲康区藏族历史与文化，但这本书对我之后走上这条路是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的。在此之后，我又读了方国瑜先生早年发表的《麽些民族考》和方国瑜、和志武二位先生1979年发表于《民族研究》杂志的《纳西族渊源、迁徙和分布》这两篇重要论文，还借阅了民族问题五套丛书中的《纳西族简史》，并看了一些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对纳西族历史文化才开始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而且知道了一直到明清四川盐源一带也是麽些人的重要分布地区。1988年，我第一次到了向往已久的丽江。当时的丽江，旅游者虽已有了一些，但并不多，古城里还没有大批旅游者带来的拥挤和喧嚣。那次在丽江我只待了几天，每天都在古城街上、河边转悠，抬头仰

望朵朵白云，极目远眺皑皑白雪，清清流水，袅袅炊烟，户户飞花，家家流泉，还有那古老的四方街，身穿民族服装的纳西人，一切的一切，是那样的恬静，那样的和谐，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深刻印象。作为在城市里长大的我，当时有了一种到了世外桃源的感觉。在那一次的丽江之行中，我还亲眼见到了以前只是听说过的东巴经书，经书上一个个古老的纳西文字，虽不知其意，但使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纳西族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悠久，也进一步引起我对纳西族历史文化的兴趣。20世纪90年代，我又去了两次丽江。每去一次，这方面的兴趣也就增大一次。我便开始考虑：要安排一些时间，对纳西族历史文化进行一些研究，争取对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从有计划地收集纳西族有关资料、读资料，到分析问题分析资料、开始研究，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直到1999年，才真正动手写有关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论文。那一年的下半年，我读了郭大烈、和志武二位先生著的《纳西族史》，结合以前看过的有关资料，我产生了应就《华阳国志》所记摩沙夷问题写点什么的想法。从那年开始动笔，我就一直没有停步，先后撰写并发表了有关学术论文共30余篇，出版了《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主持修订了《纳西族简史》。

我在纳西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重点及部分成果是：

一、纳西族族源与纳西族历史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纳西族族源问题一直是纳西族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在阅读了大量史籍和文献后认为，纳西族先民确与南下羌人有关，但不仅仅是与牦牛羌有关，还与多弥羌有关，并且，纳西族还有夷系民族的成分和藏地氏族部落的成分。因此，我主张纳西族也是一个多源的民族。在这方面，我撰写了《纳西族族源及与藏族的渊源关系》、《纳西族与古羌人渊源关系的又一证据》、《试论多弥羌与纳西族、藏族族源的关系》等多篇论文。

纳西族历史前人已做过大量研究,取得不少有着重要影响的成果,但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纳西族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如:唐代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的 Vjang 是指磨些还是南诏,学术界直到现在仍存在争论。我综合分析唐、吐蕃、南诏三方的记载,明确提出吐蕃文献中的 Vjang 只能是南诏。我先后围绕此问题撰写了《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Vjang”》和《唐代磨些部落与〈格萨尔王·保卫盐海〉中的“姜国”》等文。又如,唐“松外蛮”是否是磨些?唐宋“东蛮”是否也是磨些?如果其中有磨些,又是哪些部落?对这些问题,我查阅了不少史籍,在比较分析各书记载的基础上,我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先后撰写了《唐松外蛮考》、《也谈唐宋“东蛮”中的磨些》等文。再如,雍正初,清王朝决定丽江改土归流,此时决定改土归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结合藏族史的研究,首次提出丽江此时改土归流与罗卜藏丹津反清有关,因丽江在当时已被纳入治藏大战略之中。相对而言,有关纳西族史的研究开展得早一些,成果也较多,研究也较为具体、深入。

二、纳西族文化研究。与纳西族史的研究相比,纳西族文化研究前人取得的成果更多,中外学者出版的纳西文化研究的专著已有不少,有的影响非常大。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我认为,在东巴教、东巴文等方面尽管前人已取得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但纳西文化的诸多方面仍有不少具体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尤其是在民俗文化和与其他民族文化交往方面。我选择了纳西文化中若干具体问题来开展研究。如,结合面具研究,我对纳西族面具作了专门调查,撰写了《藏汉文化影响下的纳西族面具》一文,首次根据其不同文化特点,明确将纳西族面具分为不同的几种类型。结合地方志研究,我先后撰写了《乾隆初年的纳西族民俗——读乾隆〈丽江府志略·礼俗略〉“风俗”》、《光绪〈丽江府志〉

的几个问题》等文。这几部方志虽然不少学者引用过其中的材料，但以前并没有人从文化角度去进行专门研究。明代纳西族分布区域扩大，纳西移民进入川、滇藏区后，纳西文化也在这一带藏区扎下了根。纳西文化与康巴文化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过去也没有人作过专门探讨。我在看了大量地方志和调查材料后，撰写了《纳西文化与康巴文化》一文，首次对这一关系进行全面分析，并明确提出纳西文化为康巴文化的形成、丰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以说，在这方面我关注的问题都不大，只是一些具体问题，但多为学术界鲜有人研究的问题，同时也是纳西文化研究不能忽视的问题。

三、纳西族与其他民族历史关系的研究。纳西族主要分布在川、滇边多民族地区，这就决定了在研究纳西族历史文化时，要注意周围民族的迁徙活动和文化发展对其产生的影响，并要注意川、滇、藏毗邻地区政治军事局势变化及民族间的冲突对其带来的冲击。在相关的研究中，我不是孤立地去看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而是将这些事件和人物活动置于民族交往和民族间相互碰撞的大背景下去观察。在这方面我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实事求是地讲，我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并不全面，只是重点对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进行研究。除此之外，纳西族与其他民族的历史关系就研究得很不够，只是在《道光〈木氏宗谱碑〉——汉文化影响的见证》、《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及其对川滇边藏区的影响》等论文中有所涉及。很明显，在今后的研究中，纳西族与白、汉、蒙古、彝等民族历史关系的研究还需要加强，否则就不可能正确认识纳西族的历史和其文化特点的形成。

纳西族历史文化的研究现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新出版的专著已有不少，研究领域也得到不断扩展，这是件大好事。我在这方面已进行的研究和探索还很不够，系统的研究还远谈不

上，不少问题的研究也缺乏深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这些成果的发表，只是想提出问题以期引起更多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来关注纳西族历史文化。这本文集如果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将为之感到由衷的高兴。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在汉文史志中，纳西族的先民最早被称为“摩沙夷”，后又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历史志中被书写为“磨些”、“末些”、“摩娑”、“麼些”、“摩梭”、“莫梭”、“麼步”等，都是纳西族先民称谓的同音异写。这本文集所收论文时间跨度大，又涉及不同地区和文献，所以没有也不宜统一为“麼些”。

赵心愚

2009年1月15日于西南民族大学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
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
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之?”听到这
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之傲慢,同时也感慨纳
西学学科建设之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
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
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
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出版一套纳西学
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30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西
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
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
世纪30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
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关介
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纳西学粗具
规模,刘半农、董作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开始关
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国瑜、赵银

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 28 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人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地展示纳西学

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信将古厓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壁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进而至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里,纳西学已经产生《厓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厓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山田胜美、君岛久子、西田龙雄、方

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林向萧、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蓂、余嘉华、諏访哲郎、和发源、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云峰、和品正、牛耕勤、木基元、木仕华、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斋藤达次郎、村井幸信、荒尾丰、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由此我们也可以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出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存在的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成就突出者均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仕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李有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备感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于北京寓所

我是这样走上纳西族 历史文化研究道路的(代治学简历)	1
试论多弥羌与纳西族、藏族族源的关系	1
从纳西族先民的迁徙路线看藏彝走廊 古代通道的基本特点	22
《华阳国志》所记 “宾刚徼白摩沙夷”考辨	40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vjang”	51
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	58
唐代磨些部落与《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 中的“姜国”	74
唐代滇藏间的交通及对丽江地区的影响	86
也谈唐宋“东蛮”中的磨些	98
纳西族木氏土司家谱 所记蒙古始祖问题的探讨	112
略论丽江木氏土司 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	127
木氏土司退出川滇藏区及 重新控制这一地区的企图	139
罗卜藏丹津反清与丽江的改土归流 ——试析雍正初丽江改土归流 的主要原因	156

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的两个问题	171
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百年回顾	181
乾隆初年的丽江纳西族民俗	
——读乾隆《丽江府志略·礼俗略》	
“风俗”	212
道光《木氏历代宗谱碑》	
——汉文化影响的见证	226
咸丰《冕宁县志》的资料来源、	
篇目特点及纳西族史料价值	235
光绪《丽江府志》的几个问题	250
宣统《盐井乡土志》的特点	
及西藏麽些人记载的史料价值	264
纳西文化与康巴文化	277
从东巴经书物质形式	
看藏文化对纳西族的影响	289
四川纳西族神话的地方特点	302
藏汉文化影响下的纳西族面具	314
从东巴象形文字看纳西族	
的传统纺织技术	324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藏族面具
的分布 333

唐贞元铁桥之战后滇西北地区
民族分布的变化

——兼及唐代藏彝走廊南端民族迁徙
的原因 345

后 记 360

试论多弥羌与纳西族、藏族族源的关系*

在纳西族、藏族历史关系研究中，两个民族的族源存在什么关系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不少中外学者都对此发表了看法。本文根据纳西族的传说及东巴经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纳西族的多弥传说及送魂路线

在纳西族族源问题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以往所依据的材料多是汉文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对纳西族关于本民族族源的传说等却长期重视不够。有的学者在研究中虽也依据东巴经中的有关内容指出纳西族原居住地应在北方，但多是以此证明南徙的古羌人——牦牛羌为纳西族先民的观点，对与牦牛羌无关的纳西族关于自身起源的传说等线索仍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在丽江一带的纳西族中，直到现在仍有这样一种口头传说：他们的祖先原并不居住在云南丽江，而是住在北方一个名叫“多弥”的地方，后来才沿金沙江等河谷往南迁徙到达现居住地。由于年代久远，具体说法又不太一致，有的说多弥是一大草

* 本文原载《2001年民族史学术研究会论文》。